

寇延丁 著

他们是思想的行动者 他们是理想的追求者
他们期待的不是物质的回报
而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
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公益行动者
他们 是真正的志愿者

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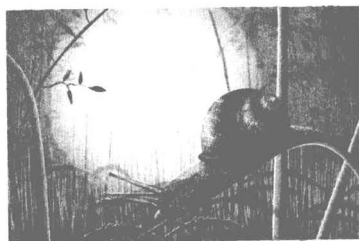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寇延丁 著

他们是思想的行动者 他们是理想的追求者
他们期待的不是物质的回报
而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
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公益行动者
他们是真正的志愿者

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寇延丁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443-2273-7

I. 一... II. 寇... III. 志愿—社会服务—中国 IV. 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3881 号

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

责任编辑: 夏 蓓

执行编辑: 林 涛

装帧设计: 苏 婧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E-mail: books@21hor.com

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版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7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43-2273-7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版、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

前言：寻找清澈的眼神

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做什么？

我用“写一本书”来走近中国的非营利性民间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了解和学习它们做事的方法，也校正了一些人云亦云的误解。

希望通过这本书，对别人也能有此功用。

非营利性民间机构是一个太过丰富也太难表达的存在，我要写什么呢？

我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切入点，有朋友提到了年轻人中的“不工作一族”，萎靡、颓废、全无朝气，从这些年轻的脸上看到的却是垂暮的眼神。人上一千，形形色色，关于眼神的那段话提醒了我，要写那些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遇到的眼神清澈的普通人。

这可能是一个最最匪夷所思的选材标准，不是行业门类、工作性质、贡献成就，也不是个人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做此选择，我有我的理由，按照那样的标准，已经有许多学术论著、研究文献、新闻报道、网络信息或者口耳相传，我觉得那个标准跟我有距离。我只是一个想了解非营利性民间机构的普通人，我想知道的，是非营利性民间机构里普通人的故事。

眼神清澈，说明他们是坦诚率真、脚踏实地又心怀梦想的人，并且，对自己的选择存有一份喜乐之心。我非常看重最后一点，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提起非营利性民间机构，许多人会与“雷锋精神”、“无私奉献”联系在一起，崇高的道德理想，沉重的社会承担，艰苦的奉献经历，确实让人崇敬，但又敬而远之。较之其他部门，非营利性民间机构的理想主义色彩确实更重一些，但置身其中的毕竟都是普通人。痛苦很正常，艰苦也很正常，但痛苦和艰苦并非全部，除此之外，还有快乐，有事业追求的成就感，也有普通人的生活乐趣。采访的过程中我特别留意这份“快乐”，他们工作的意义并未因此减损，相反，让我觉得更真实，也更可亲。

在我的眼里，在我的书里，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是普通人。因其普通，是我也可以这么做的，是我们也可以这么做的。



前 言：寻找清澈的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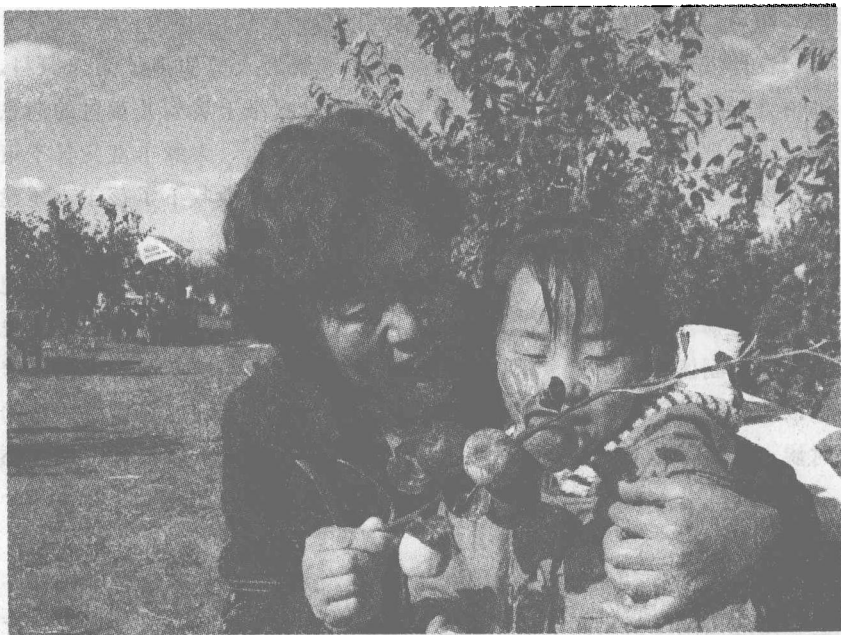
张淑琴：从丐帮帮主到社会企业家	1
李 涛：灾难面前我们不做木头人	14
马小朵：路遥知马力	24
孙 恒：歌者行于途	35
吴登明：环境保护从来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	46
吴昊亮：走出低水平重复建设	57
杨云标：需要	66
赵 丽：在沙漠里种小草	78
翟 雁：用生命影响生命	86
翟明磊：说出了真话的孩子	94
周永宏：我们一道前行	106
周 宇：一直向上走	114
李 波：假如天堂都在劫难逃	122
郑 冰：三千农民办农会	138
王树霞：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世界	151
王殿敏：人生没有回头路	156
刘忠训：全能农民	161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棵成长中的树	168
邱建生：用什么照亮心灵	170
袁小仙：最根本地做一件事	181

潘家恩：淬火激情	188
黄志友：赤脚走在土地上	197
严晓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204
袁清华：摸索在困惑与失落之间	211
刘健芝：念书应当有意义	219
谢英俊：安得广厦千万间	234
代后记：做一个行动者	250
编辑手记：与高贵的灵魂相遇	258

张淑琴：从丐帮帮主到社会企业家

1996年5月26日，中国第一个为犯罪服刑人员代养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救助机构——陕西省回归研究会儿童村在陕西三原县东周村成立。那一年，张淑琴47岁，曾是陕西省监狱局《新岸报》记者，这个警察、作家、母亲，把自己的人生与这项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自那时起，儿童村无偿为服刑人员代养未成年子女，还提供医疗、教育、心理辅导、权益保护及职业培训服务，使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儿童村自创办至今已走过十余年风雨历程，目前在全国建有四个分中心，实现救助一千余人，张淑琴本人也从一个“沿门乞讨”的丐帮帮主成长为一个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产业自给的社会企业家。



因势利导，先把好事办起来

最早的儿童村是“陕西省回归研究会”的一个实体，回归研究会是一个帮助罪犯回归社会的民间组织，按社会团体在陕西省民政厅注册登记，挂靠省社科联。

成立第一个儿童村，张淑琴靠的是“动之以情”。她在监狱系统工作多年，创作了大量相关影视、文学作品并多次获奖，走遍了省内监狱，并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许多罪犯家庭，对与服刑人员子女相关的问题感受至深。张淑琴关注服刑人员子女的事不是一天两天了，回归研究会的成员多是西安名流，既有著名的作家文人也有退休的省级干部，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是共同的特点。张淑琴动之以情说服大家：服刑人员子女生活无着只得流浪、乞讨，面临失学、饥饿、疾病、虐待的威胁，既影响罪犯改造也容易造成第二代人犯罪，把这些孩子管起来于国于家是不是一件好事？是好事，是好事那就先办起来再说。

取得了研究会内部一致只是一个前提，为了能将儿童村落到实处，张淑琴又找到了曾经在“文革”中蒙冤入狱的致富带头人郭建华，以及他领导下先富起来的东周村，办起了第一个儿童村。儿童村的开村仪式也搞得不同凡响，副省长到了、司法部副部长来了，媒体聚焦、赞誉如潮。随后两年又建起了第二个、第三个儿童村。

在西安市新城区太华路办事处，有一个服刑人员的孩子无人照料，办事处工作人员已经轮流照顾了很长时间，从报纸上看到儿童村的消息后，也想把孩子送来。张淑琴有多年新闻工作经历，人脉丰富又善于策划，深知如何用舆论的影响借力打力，她不仅爽快地收下了孩子，还建议对方搞一个交接仪式将已经做过的好事宣传出去。

交接仪式的效果非常好，十多家媒体到场做专题报道，大家还在现场捐款捐物，气氛热烈隆重。新城区主管副区长亲自到场，张淑琴不失时机地向副区长介绍儿童村，提到类似机构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希望以后在新城区也能有一个这样的机构。说来也巧。随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有记者问副区长：“区内是否还有这类孩子？如果有，是否还要送往三原儿童村？”结果，那位副区长当场表态：新城区也要办一个儿童村。

虽然多少有点“激将”的味道，但有了政府牵头，事情就会好办一些。由这位副区长出面联系，企业出钱，教育局免学费，卫生局免医疗

费，很快就办起了第二个儿童村。

建第三个儿童村的时候，张淑琴定点攻关，专程赶到宝鸡去找一位兴建了影视城的总裁。当地很多企业为求财源广进花钱修庙、供财神、供关公，而张淑琴劝他拿钱来办儿童村：“你干的是文化生意，就该与慈善事业挂钩，如果能建这么一个儿童村，权当是修了个庙，把钱花在孩子们身上不亚于供财神。这样，你才有特色，有发展。”办了儿童村，既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又能提高知名度，吸引游人与合作伙伴，何乐而不为？第三个儿童村，就这么办了起来。

从沿门乞讨到大张旗鼓办筹款晚会

儿童村是办起来了，但运营维持的费用还没有着落。三个儿童村，收养了六十多个孩子，要吃、要穿，要付医疗费、教育费，钱从哪里来？

为了筹钱，张淑琴从这家企业跑到那个单位，她管那种到处求助的行为叫“沿门乞讨”：没有几万给几千也行，实在没有钱捐点柴米油盐、药品文具也行……那段经历改变了张淑琴，一个原本一谈钱就脸红的文人，硬是练就了一身化缘演说的功夫。讲那些犯罪的父母和孩子的悲剧，也讲到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既有儿童村的故事也有人道主义理论，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慷慨激昂，或声泪俱下。有人被她打动了，向儿童村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也有的任她说下天来，依然打动不了铁石心肠，张淑琴还得起身道一声谢，提到那段专拿热脸去贴冷屁股的日子，她总是自比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武训。

儿童村就这样惨淡经营，有时还要贴上自家的钱，张淑琴觉得如此下去不是办法：我们明明做的是好事，为什么就不能大张旗鼓挺直了腰杆子做呢？

她开始策划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并为之四处奔走。先到北京得到司法部的同意，又忙着准备节目。登台演出的既有演艺界名人如陈强、孙晓梅，也有儿童村的孩子们，还有公安干警、社会各界人士和正在狱中服刑的犯人。晚会的名称就叫《伸出你的手》，意在倡导社会各界万众一心，共行人道。

晚会现场认捐气氛热烈，工薪阶层各尽所能，到场企业也慷慨解囊，有捐2万元、3万元的，也有的一下就捐出了10万元。晚会电视直播后反响强烈，市民都把救助服刑人员子女看作积德行善的义举，除了

捐款捐物，还有人进行了“家庭助养”，不仅向儿童村提供长期资助承担某个孩子的生活费用，节假日还把孩子接来给他以家的关怀和温暖；企业则把资助儿童村视为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机会，先后有 20 余家企业、学校和单位表示愿义务承担孩子们的生活费、免费接收孩子入学等，并送来大量衣物、用品和图书。

儿童村的故事流传到香港，即有善心人士捐资 20 万，并在儿童村设立“黄诗田平安之家”，德国和日本的电视媒体也相继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里，并在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对儿童村的新一轮关注……

先有了破庙才能吸引香火

2000 年，在成功地兴办了陕西的三个儿童村之后，张淑琴把目光投向了北京。

张淑琴清楚地知道，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问题绝不仅是儿童村几十名孩子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于犯罪服刑人员未成年的子女，只有我国《监狱法》第 19 条提到了“罪犯不得携带子女进监狱”，这些孩子应当由谁来管、怎样安置，却是一个未知数，但我国有 60 万这样的孩子（《中国青年报》2006 年 7 月 4 日《司法部预防犯罪课题报告》）。面对这样的问题，仅凭一己之力，仅凭几个儿童村的力量只是杯水车薪，只有推动政府，从政策法律的高度做出相应改变，将个体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张淑琴要做的，就是把儿童村办到我们国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个问题，进而关注这个问题。

北京不比陕西，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占，一个人，带着一个想法，赤手空拳跑到北京，要凭空创办出一个民间组织，难度可想而知。北京儿童村的兴办过程千辛万苦，一本书都写不完，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困难，一直在为张淑琴做助手的小女儿在工作中出了车祸几乎丧命，原单位又因“不务正业”停发了她的工资，最困难的时候张淑琴三天里就瘦掉了七斤。但她还是挺了过来，儿童村终于落户在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

最初儿童村只有六个孩子，三位工作人员，住在跟一位企业家借来的破败不堪的院落里，有人一看心里就凉半截：这种破地方能干什么事呢？而张淑琴却有她的一番理论：“办儿童村难不难？难。这么难的事为什么能够撑到今天，我有我的办法。再好的事情，光说不行，必须有

一个实体展示给人，别人才能放心，才有可能支持你。先有了破庙才能聚香火，有了香火，才能重修庙宇，重塑金身。”

张淑琴开始施展浑身解数聚拢香火，筹来资金扩大规模，修建活动室、图书室，很快就发展起来。

这个“破庙”引来了香火，也引来了更多的责任。北京的法院、监狱、派出所慢慢知道了他们，经常往这里送孩子。一年后，儿童村的孩子增加到40多个，而且还在继续增多，张淑琴必须重修庙宇了。

本来，儿童村租用了板桥村56亩集体用地做孩子们的劳动基地，张淑琴就在这片地上勾画了未来儿童村的版图。她自己勾勒出一幅蓝图：在这块地上建起含食堂、礼堂、音乐室、图书馆、婴儿室在内二十余栋建筑，其间还有各种小园林、花园、葡萄架、秋千架等娱乐设施，能够容纳一百多个孩子、五六十名员工。

张淑琴给这个儿童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太阳村”，她希望这里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孩子们能够在这个美丽的、花园般的太阳村里走出阴影，快乐地生活。但是，看到这个规划的人都被吓住了：完成这样的规划怕是需要几百万，到哪儿去找这么大的一笔钱？

将宏大的善举化整为零

对于这样的疑问，张淑琴成竹在胸，她的办法就是：化整为零。

她将整个太阳村的建设计划分解成了几十个小项目，一栋房子、一个大棚、一段路，有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大项目，也有几万元的小项目。她甚至把整个太阳村的绿化计划也分解开来，具体到一片花圃、一棵树苗，有许多几百元甚至几十元的小项目。然后，张淑琴拿着这些东西开始了新一轮化缘，有关机构和企业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出钱认捐，也可以根据统一的设计规划自己包工承建，都会挂上资助机构的名称，永远不变，甚至是一棵小树苗，也同样会挂上捐赠者的名牌。建一栋可供十四人居住生活的爱心小屋只需六万元，却会收到极好的社会效应，太阳村备受媒体和公众关注，还不时有包括外国王后和总统夫人在内的社会名流造访，参与建设本身就成了—种极好的公益形象的宣传。很快，德国大使馆捐助的德国妈妈爱心小屋建起来了，瑞士诺华小屋建起来了，戴姆勒克莱思勒小屋建起来了，丹麦格兰富、青鸟健身、北京扶轮社、香港辉煌基金会、顺义国际学校……太阳村的十五座建筑就是这么建起来的。

不光是要吸引企业参与太阳村的建设，张淑琴还设身处地为企业着想，看怎么能够创造机会为企业带来最好的社会效应。本来，青鸟健身俱乐部捐助的小屋建成后计划由企业老总和张淑琴剪彩，这时张淑琴得到消息，瑞士联邦主席夫人将来太阳村参观。于是她主动与青鸟协商，将剪彩仪式推后一段时间，请主席夫人为小屋剪彩，剪彩仪式上，张淑琴把企业老总安排到主席夫人旁边最重要的位置。这样一来皆大欢喜，来宾高兴，企业满意，张淑琴则想得更远：“第一次帮助我们尝到了甜头，第二次他们还会来帮助我们。”

这种方式极大地调动企业做公益投入的积极性，建设初见规模之后，愿意锦上添花的企业越来越多，甚至于当一些后来的企业也表示愿意捐助建设这样的小屋时，太阳村的建筑计划已经完成了，张淑琴又给他们出主意：那就捐助太阳村的道路和其他设施吧，我们照样会把你们的名字写在这里让人们看到。于是，又有了雪花大道和新世纪大门，有了第三极阅览室。如此一来，企业由被动出资变成主动参与到太阳村建设中来，而且觉得，这样做很值。

兴办产业，从根本上改变“行乞化缘”的筹募方式

北京的太阳村建起来了，目前有 144 名孩子生活在这里。包括北京在内，太阳村还在全国设有四个分中心，分别是陕西回归儿童村，有工作人员 10 名，孩子 63 名；河南新乡儿童村，工作人员 5 名，孩子 26 名；陕西陇州孤儿院，工作人员 7 名，孩子 22 名。

四个太阳村，250 多名孩子，每年一百多万的运行成本，每个月没有八万块钱就过不去。在无数场合，张淑琴开口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钱！我们需要钱。钱不是万能的，但对太阳村来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化缘的技巧已经被锻打得日趋纯熟，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太阳村，她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终日奔波、上门化缘了，但是，当她仍然一遍遍向着不同的来宾发表相似的“化缘演说”的时候，张淑琴清楚地知道，自己以及太阳村那种“行乞化缘”的地位依然如故，太阳村的孩子们依然是靠天等雨的秧苗。她觉得，好事不能总是这个做法。

太阳村已经在风雨坎坷中走过了十年历程，张淑琴从张阿姨变成了张奶奶，也在这个过程中百炼成钢，她要兴办太阳村自己的产业，用产业的产出来维持太阳村的运行成本。

从2005年起，张淑琴通过各种途径发布信息，面向社会，广纳贤才，欢迎那些有爱心、有奉献精神、热爱公益事业的高素质人才加盟，特别是外语流利，有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人才，成立了太阳村的产业部、项目部和发展部。要通过自办产业的推广，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有效减少非营利性民间机构组织对捐款的依赖，为太阳村自身运营提供资金保障，成为这项事业发展的坚实后盾。

慈善也有“产业结构”

张淑琴开始念“生意经”了，平常走在太阳村里，张淑琴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捡到篮儿里的都是菜，抓到手里的都是钱”，她要让太阳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变成钱。来太阳村参观的人多，特别是周末就更多了，太阳村远离市区，人们一般都要在这里吃一顿饭。到了周末，除开放食堂以外，太阳村还常办小集市，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自己动手包包子，做凉皮、菜饼、烧烤一类的小吃出售。2004年，食堂和小集市收入2万多元，一方面是钱的收入，同时锻炼了孩子们的自立能力。2005年，餐厅、小集市和艺术画廊的收入为87920元。

小集市和艺术画廊既是太阳村救助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成了资金筹募的一种方式。

来到太阳村的孩子，每个人都有过一段不幸的经历（以北京太阳村为例，每两个孩子中就有一个的父亲或者母亲刑期在十年以上，每四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的父母双双入狱，每十名孩子中就有一名父母双亡），许多孩子有流浪史。曾经的一切给他们留下了心理创伤，针对孩子的心理问题，一方面请心理辅导老师和社会上的心理专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同时也在太阳村开办了一系列活动进行疏导。除进入当地学校随班就读之外，孩子们回到太阳村后还可以选修武术课、音乐舞蹈课和美术课。艺术创作的过程和结果都是美好的，可以陶冶情操，增强孩子们对世界的信任感，培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太阳村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的组成部分。

产业部成立之后，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进入社区或企业的宣传筹募活动，都会带上一些孩子们的美术作品，绘画、剪纸或者刺绣，一方面，这是太阳村素质教育和心理辅导的成果，展示了孩子们的才华，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也标价出售，成为一种筹募资金的方式。2007年，太阳村计划将画廊和小卖部交由三位老师负责管理，一年完成20万元的筹

募额。

现在，张淑琴爱拿太阳村和企业做一个比较，企业要做的是让大众掏钱购买自己的产品，太阳村作为一个社会公益事业，需要向大众“推销”的则是“慈善产品”。企业推销产品都讲“产业结构”，太阳村亦然。在太阳村的“产业结构”里，建造爱心小屋和兴建新的儿童村这样的“大宗产品”是“销售”给大企业和基金会的，更为宏大的比如在广西和东北兴办太阳村分中心一类的计划差不多可以算是“融资规划”了，每年支出四千余元的“儿童助养计划”主要是面向中产阶层的。而“慈善产品”更大的市场则应该是普通老百姓，产业部的推广计划也是重点针对这个人群的，50元、100元的“爱心认树”面向北京人数众多的普通市民，要在普通市民中推动“慈善消费”。

爱心认树，产业、社会捐助、市场营销三位一体的尝试

从2002年起，刚刚在北京站住了脚的太阳村就租种了附近260亩土地，建起了自己的农场，农场的员工有太阳村的工作人员，有在当地聘请的工人，也有太阳村长大的孩子和他们刑满之后安置就业的父母。

农场既是太阳村里孩子们的劳动基地，也将是未来太阳村自给自足的根本，种植了3万株枣树，她想用卖枣的钱养孩子。但种枣投资收益期长，终于到收获季节还要面对“卖枣难”的问题，他们受到启发之后从2005年开始发起“爱心认树”活动，问题迎刃而解。爱心人士提前交钱认树，果实成熟时来枣园采摘，从春天起就可以开始有收入，当年爱心认树实现7000棵，筹资35万元，再加上秋季采摘后的销售，一共收入60万元。2006年认树1万余株，模式也日趋成熟，新探索出可视认树、分块认植、和爱心小树共同成长等项目，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对慈善消费的需求。

50元钱，就可以在太阳村认植一棵梨枣树。太阳村承诺负责枣树的一切管理工作，将认树者的名字挂在枣树上，认植者随时可来了解果树生长情况，以及利用节假日来这里体味市郊风景、观光、休闲，或者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太阳村会通知认植者前来采摘，和孩子们共享采摘的乐趣。一株3年树龄的梨枣树结果10斤左右，就是在北京市场上买，也差不多要花50元钱，把这50元交到太阳村，不仅可以得到枣，得到这么多的乐趣，同时还是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一份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张淑琴和产业部同仁原计划 2006 年度通过枣树认植筹资 100 万，现在只完成了 70%。这年夏季的桑拿天和入秋后的高热使枣园产量大受影响，太阳村不得不从山西外购数万斤补给认树的爱心人士，但枣园还是迎来了喜人的前景，在进入采摘季节后，这里受到了北京市民前所未有的关注，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八百多人，来的人不仅仅是采摘，许多人又现场付款参加 2007 年的爱心认树，太阳村现有的枣树已经有些“供不应求”了。

2005 年，太阳村的枣园是独立经营；2006 年变成了合作经营，相邻的一位老板将自己的冬枣园加入进来，他负责行政管理和统计果实数量，太阳村得到认树收入的 30%；看到太阳村枣园的红火劲，当地枣农都纷纷找到太阳村要求加入，2007 年将要成立一个枣业集团公司，通过合作达到 5 万余株种植规模，计划实现 150 万筹资目标。这将是太阳村对产业、社会捐助和市场营销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新型运营模式的大胆尝试。

旧物资变善款，自助，同时助人

实物捐赠是人们常用的慈善方式，北京太阳村成立不久就收到了大量北京市民和大学生社团捐赠的实物，有食品、新衣、新文具，也有旧书、旧衣服、旧家电家具。对于送来的东西，太阳村分类清理，能穿的穿了，能用的用了，实在派不上用场堆在仓库里，很快一间屋就满了，然后，一间变两间，两间变四间。

怎么样处理这些旧物资，张淑琴犯了难，不收吧，会伤了公众的心，收呢，又不知如何处理。她开始想办法对旧物资翻新利用，太阳村规模扩大后需要大量的褥子，选出一批实在不能再用的旧衣服打碎成绒，又用宾馆淘汰后捐来的一批旧窗帘做面，作成了一大批褥子，除了自用还有剩余，正好一个建筑队来太阳村讨要施工费，张淑琴又作价 40 元一床顶了账。

2005 年 11 月，太阳村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物资中心，敞开大门面向北京市民接收旧物捐赠，甚至欢迎旧电脑、家用电器和报废的旧车，这些旧物资的分拣、消毒、维修、利用需要大量人工，可以安置刑满人员就业，也可以给太阳村学习电器维修的孩子提供实习机会。

对这些旧物资，太阳村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卖，不仅在板桥村打工人员聚集的地方开办爱心超市，也在贫困山区和煤矿设有几个销售



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

点，已实现收入 20 万元。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旧物资变善款不仅仅是为太阳村自身筹款的一种途径，同时还是一项扶贫事业，一方面，通过这些廉价的旧物可以节约低收入人群生活支出，另一方面，收回来的钱里也会有一部分用于给予贫困地区资助，甚至直接用物资方式向贫困中学和贫困地区提供支持。

理直气壮兴办社会企业

在推广爱心认树计划时太阳村采取了多种方法。通过媒体资源向大众传播，通过电话营销向各大机关和有联系的机构推广，同时也向来太阳村参观的爱心人士现场宣传，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太阳村地处远郊，普通市民若是专为认树来一趟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产业部成立后拿出规划，要在北京市的社区里设立 200 个爱心站点，把向太阳村孩子献爱心的场所办到北京市民的家门口。

关于爱心站点，最初的设想是将认树 3 万棵的宏大目标化整为零，每个站点只需完成百余棵认植目标。一般是由关注太阳村的爱心人士在社区提供兼职的志愿服务并联系免费场所，有的是在居委会，有的是在社区医院或者文化活动中心，爱心站点代收认树的善款，也代收社区居民捐赠的物资。后来随着站点工作的推进大家想到，既然设立了这样的爱心站点，不妨让每个站点都能有一个“小太阳村”的职能，可以在这里摆放有关资料，让社区居民不必到太阳村就能了解相关的情况，也可以将孩子们创作的美术作品标价出售，甚至还还可以开办爱心超市销售旧货中心的物资……

爱心站点的职能越来越具体、实在，也有了越来越重的“经营”的意味，让设计者自己疑惑了：一个非营利性民间机构这样做合适吗？这样在社区里又收又卖的会不会给人一种“开店做买卖”的感觉，从事经营活动会不会影响太阳村在大家心目中的公益形象甚至影响到太阳村的事业呢？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张淑琴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磕磕碰碰地走在了制度设计和经验范例的前面。为了筹款张淑琴甚至不惜“沿门乞讨”，她是作为一个悲情英雄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面对一种不得不为的社会需求，以她忘我奉献的经历、无懈可击的行为方式，以她所代表的事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感和感召力影响、打动人们，募集善款，这也是中国民间组织大多走过的一条路。但这是不是必须一直这样走下去的

唯一的路，是不是一条长期的、可持续的并且是让身处其中的人能够自尊自主的发展的道路呢？仅仅这样显然是不够的。虽然在公共心目中、甚至包括那些从事类似事业的人自身，已经渐渐接受、认可了这种方式。

十年来，张淑琴经历了许多尝试，做出了许多改变和创新，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是为太阳村的生存和发展应运而生，是为了做善事的人自己的生存和尊严：“为了孩子，我们愿意低下头去求人，有了自己的产业，就可以挺起腰杆做事了。”但是，当这项事业发展到即将融入市场的时候，这个无所畏惧的女战士还是犹豫了。

其实，早有先行者在用行动给了这个问题以答案，不论是久已有之的英国乐施会社区慈善商店、美国救世军慈善二手店还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韩国美丽基金会美丽商店和英国的 Track 2000，也包括香港的女工合作社所做的有益尝试，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都是在社区内收售旧物，是环保和社会生活相结合的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经营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存在的企业。当初，太阳村不得不以“企业”注册包含着张淑琴太多的辛酸悲苦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到如今，先行者的尝试和“社会企业”的自我定位打消了张淑琴的疑虑，社会企业，同样也是理直气壮地在做社会公益事业。

2007年，太阳村将全力推动北京市爱心站点建设，并以这些爱心站点为依托，把太阳村的公益事业、把已有的旧物资变善款和在社区内倡导志愿服务、环保节约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等结合起来，太阳村也由单纯的受助者向互动的社区公益事业倡导者和带动者转化。

伸出你的手，拉住更多的手

太阳村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成功救助了1000余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张淑琴说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个救助数字将变成10万人次，这种对犯罪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注将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行为。

10万人次，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张淑琴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不是我一个人的手能够拉住多少手，而是要让大家伸出手去，就能拉住更多的手。”

解决问题的根本是推动立法改变，最大的力量是国家的力量。最初创办儿童村的时候，服刑人员子女是个真空地带，民政部门、公检法司